

## 目 錄

- 關於社會學，說幾句話……………費孝通（ 1 ）
- 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宣傳工作會議上的發言（摘要）……………費孝通（ 4 ）
- 在“爭鳴”月刊召開的座談會上的發言（摘要）……………費孝通（ 5 ）
- 社會學的對象和內容決定於它的任務……………費孝通（ 6 ）
- 人口問題研究搞些什麼……………費孝通（ 9 ）
- 重訪江村（另印）……………費孝通
- 社會學在新中國還有地位嗎？……………吳景超（ 11 ）
- 提高民主黨派建議的質量……………吳景超（ 12 ）
- 在國家統計局召開的座談會上的書面發言……………吳景超（ 13 ）
- 一些可以研究的社會現象和問題……………吳景超（ 14 ）
- 李景漢企圖篡改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調查研究室政治方向的陰謀……………（ 15 ）  
（人民大學付校長鄒魯風同志的發言摘錄）
- 北京郊區鄉村家庭生活的今昔（另印）……………李景漢
- 在國家統計局召開的座談會上的發言……………李景漢（ 19 ）
- 開展對家庭、婦女等現實社會問題的調查研究……………李景漢（ 20 ）
- 社會學與人口問題研究……………文匯報駐京記者劉光華（ 22 ）  
——與陳達教授一席談
- 請問高教部：爲何取消勞動專業？……………陳 達等（ 24 ）
- 趙文璧在民盟支部擴大整風座談會上的交代……………（ 26 ）
- 右派分子趙文璧的“無產階級社會學大綱”……………（ 27 ）
- 社會學政治學需要發展（新聞報導）……………文匯報（ 30 ）
- 要求在大學恢復政治學課程（新聞報導）……………光明日報（ 31 ）  
（一些政法教授在上海民盟座談會上）
- 也爲社會學說幾句話（節錄）……………言心哲（ 32 ）
- “社會學工作籌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記錄……………（ 34 ）

# 關於社會學，說幾句話

費 孝 通

关于社会学，我原本不想發表什么意見的。這個問題我很久已經不再去想它了。最近吳景超先生在新建設上把社会学的地位問題提了出来，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文匯報記者要我說几句话。

## 我和社會學的關係

先得交待一下，我个人和社会学的关系。我讀書和教書的时候，的确一直和社会学有点关系的，但实在說来我和一批朋友却也是一直在这个牌子底下搞私貨，叫它什么学也說不清楚。这私貨就是少数民族、农村、市鎮、工厂的社会調查。这套东西在英美的正牌的社会学家看来是行外的；一定要归个行，倒近于英美的所謂社会人类学，我們現在称作民族学的那一些東西。但是在当时中国的大学里人类学或民族学这个牌子掛不大出来，所以一直混在社会学系里。要找个說法，我們就說，我們是用人类学的方法来調查研究中国現代社会的社会学。我們这些东西混在社会学里並不是为当时所有社会学界所同意的，至少並不是正統。所以我覺得一直有些搞私貨的味儿，說得好听一些，是一个旁出的学派。

由于我和社会学有着这么一种不正常的关系，我对于一般所謂社会学不免是有点偏見的。要我来發表意見自不免缺乏代表性。这是我不想發表意見的原因。如果只从我个人出發来談，我覺得社会学这个牌子取消了对我似乎並沒有多大关系。我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取消之前就調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我有机会去实地調查研究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一方面學習馬克思列寧主义，改造自己的立場、观点、方法，一方面还是可以利用我过去的訓練，繼續我的學術工作，我並沒有“改行”的感觉，只是覺得現在學習和研究的条件好多了。在这些工作上我一直是積極的。因为这个緣故，我也不再去想社会学有沒有地位的問題了。在我，這個問題是解決了的。社会学这个牌子取消了，我还覺得卸去了一個包袱。

## 社會學問題的提法

但是，这时候把社会学的地位問題提出来研究一下好不好呢？我覺得是好的，也是必要的。我倒並不是因为苏聯派代表出席了国际社会学会，新时代杂志上又提出了中国沒有代表出席的話，才覺得我們該考慮一下在各大学里取消社会学系是否做得对，現在應當不應當恢复的問題。我是不很贊成这种態度的。我並不想再去討論几年前大学里取消社会学系是否是正确的。我也並不想在社会学这个名詞上来做文章。我覺得應當从当前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的需要上来提出這個問題。

問題是这样提出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的过程中出現了許多新的人和人的关系。其中主要的是新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改变又要求其他方面的各种关系产生

相適應的改變。這些變化都存在着客觀的規律，我們如果能掌握着這些客觀規律，那末改造起來就順利些；如果摸不清這些規律，我們就會吃虧。這裡就有學問，也就有科學，研究生產關係的經濟學，那是有了基礎的。其他許多關係的研究我看還都沒有很好的建立或發展起來。這話說來，就牽連得多了。我也沒有考慮成熟，如果作為一般討論，我不妨說說我的意見。比如我最近調查了一些黨和非黨的共事合作關係，我意識到這裡有一門很複雜的學問，那就是怎樣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里的人民內部的政治關係。這問題可以包括更多的內容，好像人民代表大會制的運用、民主黨派的互相監督等等，有關人民民主專政的一系列問題，這些都是人類的新問題，是在階級消滅後人和人政治關係問題。把這些關係作為客觀存在的事物來研究它的變化和運動的規律不是一門新的學問麼？如果要掛個牌子，我想也可以說是政治學。

我這兩年來又調查過關於知識分子問題，其中有一方面是屬於知識分子思想的變化，那是新的政治關係在人們思想上的反映和變化，如果專門加以研究，總結一些經驗出來，我想又是政治學中的一個極有意義的部分。另一方面，我又看到人才的使用和安排，人事的管理等問題。這些問題現在是處理得不免太簡單化了些，而且的確出了一些問題的。其實，這又是一門學問，我想就是行政學或管理學。

上面所說的那些問題，現在儘管沒有進入学府來進行研究，在黨派和政府機關里是有調查研究的。但是還有些人和人關係的研究卻落了空。比如兩性關係罷。這是存在於人和人之間一種很重要的關係，但是認真地作為一種社會生活的重要部門來加以調查研究卻就很少了。現在不論是那個地方，戀愛問題、婚姻問題、夫婦問題、養老問題、兒童問題等都有一大堆，而且大家總是覺得最頭痛，甚至不知道怎樣處理才妥當的。社會進步得這樣快，這些方面都需要建立起和新的生產關係相適應的關係，而新舊交替之際，出現些混亂現象是難免的。不採取科學的態度，實事求是的進行調查研究，這些問題得不到妥當的解決，使得許多人生活不安定，思想波動，甚至違法亂紀，對社會主義建設是很不利的。

再舉個例子：最近很多人注意了人口問題。這個問題不論怎樣說法總是存在的。過去却因為批判了馬爾薩斯人口論，大家都不敢再提這個問題了，好像誰一提這個問題就該批判似的。實在來說，好好地研究這個問題正可以否定馬爾薩斯的理論，而建立起我們的正確觀點來。大家不敢談，並沒有取消這問題；以致一鬆口，就出現了“吃蝌蚪”的不科學的宣傳。我並不怪宣傳吃蝌蚪的人，更不怪吃蝌蚪的人，而要怪阻礙研究人口問題的帽子。

在這裡我不想羅列出一大堆問題來，只想指出這類問題是會跟着社會發展不斷出現的，並不會太平無事的。對於這些問題用科學方法來調查研究比閉了眼睛說沒有問題對我們有利。如果我這樣說法是對的，自然要問，誰來研究，由黨派和政府的幹部拿出一部分力量來研究好呢，還是搞一批人出來專門做這些工作好呢？我想是專業來搞應當好些。搞得出一套學問來麼？我認為是可以的。這些都是客觀存在的社會事物，它的變化是有一定道理的，分析得出一些道理來，不就是學問麼？至於這些科學稱什麼名稱，那

倒無宏旨。如果大家覺得社會學三個字不討厭，用這三個字也要得。如果很多人看了不舒服，想出個順眼些的名字來，當然也好。

也許現在還有人懷疑這些是否夠得上稱什麼學，我想也不必在這個字上引起爭執。如果大家承認這些問題有必要系統地調查一番，那就第一步先搞調查，稱作“社會調查”也可以。我想反對“社會調查”的人理由是不會太多的。

### 從事社會調查的人員

有沒有會搞社會調查的人呢？我認為是有的。其中有一部分就是以前在各大學里教社會學和學社會學的人。他們過去搞過這套調查工作，立場、觀點、方法固然有不正確的地方，但是這些是可以通过學習來改造的。他們原來學會的那些訪問、觀察、記錄、統計、分析等技術還是有用的，而且他們多少也了解過舊社會里的社會情況以及當時的問題，調查起現在新舊交替的情況時，還有很多知識大有用處。如果要搞這些工作，我願意保舉這一批人員。

取消了社會學系之後，這批人那里去了呢？現在怎樣了呢？我所知道的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很得其所哉的，在新崗位上搞得蠻起勁，要他們回老行是做不到的。我就屬於這一類。第二類是那些有了新的崗位工作的，也能勝任，但是心里還不忘舊好，有機會再繼續搞老行是樂意的。第三類是一直沒有安定的，我就知道有一位老教授，院系調整後，一連改了三次課程，改得他三日京兆，無所適從。我知道有些沒有開課，學了俄文在搞翻譯工作的。我也知道還有在政府參事室里，除學習之外，沒有什麼事做的。他們如果能回到老行來，那真可以幫助解決些知識分子的安排、使用問題，這些人的精力這樣是可以發揮的。第三類的人並不是個別的。總的看來，這項工作不是沒人。

有事也有人，但還缺一條，就是要個組織，要有領導、有計劃地進行工作。如果承認這些也是科學研究，那就應該安在科學院里，能成立個社會學研究所那是最好了。如果覺得社會學這個名稱不體面，不妨稱社會調查所。說起來，社會調查所是有個歷史的。現在北京文津街科學院辦公室的建築原來有一半就屬於過去的社會調查所的。那個社會調查所的所長陶孟和先生，現在就是科學院的副院長，其中不無瓜葛可緣。話暫且說到這里，聲明一下，我原來已不再想這個問題了。這段話是被人勾出來的，考慮得是不夠成熟的。

2月12日（文匯報）

# 費孝通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宣傳工作

## 會議上的發言（摘要）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上午）

很多人担心社会科学沒有前途。毛主席講話後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矛盾，有矛盾就要处理，要处理就得考察分析研究这些矛盾，这就需要有知識，这就是社会科学。所以它还会有广闊的前途。如当前婦女問題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什么年齡結婚好，應該有几个孩子算夠了，就需要好好研究，今後社会科学大有可为。

是否有人在研究？有些有，有些沒有，有的还未进科学之門。大的問題，例如民主党派現在就沒有一本書，政法学院中也沒有那一課講民主党派；小的問題如結婚問題，中国人平均在什么年齡結婚等等，就不知道。总之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还是薄弱的。原因是什么？

1、它与自然科学不同，同階級鬥爭关系密切，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它是統治工具的一部分，因之解放後不能把它直接拿过来为我們服务，而要加以改造。

2、有革命經驗的同志太忙，無時間写文章。

3、社会科学不比技術，不能請外国人代替我們搞，只能自己搞，但解放才几年，時間短，因此就虛一点。

有沒有力量？有，有过去搞社会科学的人，有新的力量，过去搞社会科学的人現在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改造好了的，如历史学中；一种是老店重开，但縮小了門面的，如經济学；一种是关門了事，各奔前程，如社会学。第一种好，第二种太好，第三种又好，又不好，改好了的是少数，改不好的是多数。

今後怎么办？

总的說要修橋補路。即新的与旧的要連起来，还要多开几条路出来。具体說：

1、对社会科学的想法应当改变；至少应当把它当內部矛盾处理；

2、要一行一業加以安排；

3、大胆使用，通过工作来改造人們的思想；

4、要多找些行道出来，如人民內部矛盾，大大小小开出来，讓大家研究；

5、量才使用，有的不能研究的就高文献、档案、年表等等；

6、把各种学会組織起来，作为联系的組織；

7、培养新生力量。

## 費孝通在“爭鳴”月刊召開的座談會 上的發言（摘要）

### 关于社会科学的問題

我想現在似乎還談不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比重問題。要發展社会科学還有許多基本的認識問題要澄清一下。問題是不不少的。我只想提出一個問題是怎樣發揮許多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力量問題。我考慮這個問題覺得關鍵还是在我們怎樣對待旧的社会科学。这个态度問題不解决，那些过去搞过社会科学的人的力量还是發揮不出来的。

問題是出現在有人認為資產階級社会里沒有社会科学可言，因为那些过去被称为“社会科学”的东西都是不科学的。因此，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科学要从头創造，没有什么遺產可以繼承。对于資產階級社会科学只有批判，談不到接受。这些全是敌人，是毒素。如果採取这种看法，旧社会科学是对抗的，接不上头，也沒有接上头的必要了。我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資產階級社会科学是有錯誤、有缺点的，因为它受到階級性的限制和歪曲，但是資產階級要用它来解决它社会里的問題，虽則它不能解决这种社会里的基本矛盾，但也不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在他所实解决的問題的範圍來說，他所掌握的也不可能全部是虛假的，都是些和客觀事物完全不相符合的錯覺。如果它也反映一部分事实，这一部分的知識还是应当有用的。不但如此，資產階級社会里的階級鬥爭是一直存在的，而且是复杂的。資產階級社会科学是不是只代表統治者的一方面而完全沒有代表反統治者的一方面呢？我想也不可能是如此的，那么我們为什么全部否定資產階級社会里的社会科学呢？有什么根据可以說沒有任何遺產可以接受呢？

其次是对待旧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态度問題。如果認為旧的社会科学只有毒素，那么这些人首先是消毒的問題。消完了毒，从头再来，自然不及沒有受过毒的人学起来更快些了。他們是象背了包袱赛跑，愈跑愈慢。如果認為旧的社会科学是可以批判接受的，那么旧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是个改造的問題。他們經過改造，还是大有可用的；而且經過改造，他們对社会認識得更深刻，比了沒有經過这番鬥爭的人經驗多，閱歷深，見識广。現在，我覺得第一种看法还是較佔上風。因此，很多旧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脱离了科学隊伍，或是在隊伍里發揮不了作用。这种情况我認為是不正常的，对于發揮潛力是不利的。

社会科学的隊伍里，新旧不接，少数先鋒隊背後拖着一大批發揮不了作用的“旧人物”，这个隊伍的力量自然是不会太壯大的了。力量發揮不出来，成績也就不会顯著，擺着許多需要研究的問題动不了手，社会科学的地位也談不到提高了。如果社会科学被人輕視，我想主要是社会科学的隊伍里自己沒有團結，沒有發揮力量的結果，怪不得別人。

我認為發展社会科学还得先解决这个对旧的社会科学的态度問題。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談得到真正对旧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團結改造工作。这是發展社会科学的第一步，是起碼的一步

# 社會學的對象和內容決定于它的任務

費 孝 通

关于社会学的对象和内容的问题我还没有很成熟的意見，只能提出一些看法，作为参考。

我觉得一門学科的对象和内容应当决定于它的任务，一門学科的任务是从人們的实际生活里提出来的。在規定某一个学科的对象和内容时，还需要明确和其他学科的分工，和它的特独园地。

从这个看法出發来考虑社会学的对象和内容，就必须看一看我們当前社会生活中存在着那些問題？那些还没有其他学科进行研究？这些問題属于什么性質？和过去社会学所研究的对象有没有区别？

最近幾次討論中，已經提出了許多应当进行而現在沒有研究的当前社会問題，其中最突出的是人口問題，家庭問題，城市服务問題，以及犯罪問題等等。因此可以肯定社会学是有对象可以研究的。

但是我們还没有把所有的社会問題都發掘出来，作一个系統的归类，而且对于每个問題的内容也沒有系統的摸清楚。所以在这个时候要全面的規定社会学的对象和内容还没有条件。我們是不是必須先把社会学的对象和内容弄清楚了，再动手工作呢？我想是不必要的，不妨采取一个問題一个問題逐步展开的方法，等一个时候再来系統化。

我同意很多先生所說的，过去社会学並沒有一个共同接受的定义，也沒有一个共同的所謂社会学理論系統。但是，我想是不是可以这样看：过去社会学所研究的是資本主义社会里所發生的各种社会問題，而絕大部分研究者是站在資本主义这一面，想通过他們的研究来緩和資本主义社会里的矛盾。这是主要的一面，在資本主义社会里，当然也存在革命的社会学，那就是“馬列主义社会学”，但是由于“社会学”这个名詞已經被資本主义所佔有，排斥了革命的社会学，革命的社会学也有不願用这个名詞，以免混淆立場。所以，一談到社会学，主要是指資本主义社会学。

資本主义社会学是反动的，因为它服务于剝削階級，反对革命。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样的学科是不能容許它存在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認为在我們解放後取消了这門学科的講壇是有一定的理由的。

社会主义社会里是不是也存在社会問題呢？那是应当肯定的，既然存在就应当有个学科去研究它們。那就是說，社会主义社会里应当有它自己的社会学。我們現在就是要努力建立这个新的社会学。

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社会問題在性質上根本不同于資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問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剝削階級是消灭了，生产关系是改变了，但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間，生产关系和上層建築之間出現了各种矛盾，形成了种种社会問題。在一定时期里还存在着过去階級社会余下来的本質上还是階級矛盾的問題，而且도存在着階級内部的种种矛盾。

盾，情况是很复杂的。

从表面上看，我們現在还存在着的人口問題，家庭問題等等是在旧社会中已經有过的問題，但是本質是有了变化。如果我們不掌握这个变化，从而認為旧社会学的一套可以用来研究这些新問題，我們是会犯錯誤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覺得“恢复社会学”的提法是可以考虑的。也因此，我們过早的成立社会学系也是不相宜的，我們还需要一个時間来摸索新的社会学的内容和做法。

另一方面，我們能不能說过去並沒有我們这里所說的新社会学呢？我想不能这样說。我同意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新的社会学的基础理論，在这个意义上，新的社会学可以說已經有了基础。那么是不是不必再成立一門以“社会学”为名的学科呢？那是可以进一步討論的。我的看法，历史唯物主义只是社会学的基础，它同时也是其他社会科学的基础。有了基础並不等于就有了房子。历史唯物主义教程里不可能包括許多社会問題的具体分析，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論也决不能解决具体的社会問題。因此，我看，新社会学的内容应当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論基础上，和指导下，来进行具体社会問題的分析研究，从而累积对这方面的知識把它系統化，来充实历史唯物主义。

再一方面，我們是不是要和旧社会学割断关系呢？我認為要割断的是貫串在旧社会学里的反动立場和反动理論系統。在立場上不分清是决不可以的。但是旧社会学里除了这些必須割断关系的东西外，还有一些东西是我們可以也必須繼承下来的。这些东西包括：資產階級社会里所產生的問題和事实，可以作为我們研究資本主义社会的資料。

第二，我們当前的社会实际一方面还有着旧社会的殘余，一方面又有資本主义社会的影响，这些都是我們产生社会問題的一部分根源。如果我們不了解这些，也就不容易进行充分的分析研究。

第三，旧社会学也积累了一些方法和技術，这些調查研究的方法和技術，譬如人口統計，城市的区位圖表等，都是整理材料时必要的过程。当然，在新社会里，有許多社会条件已經改变，因此原有的方法和技術也必須加以一定的改变，而且还应当創造許多新的方法和技術来分析研究新的資料。

第四，社会生活中是不是还有一部分在階級社会里就是各階級所共同的东西？这些东西好像气候等自然条件，語言等人們交际工具等，对于社会生活有一定的影响，虽則不是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因素。过去对于这些方面的知識，还是有用的知識。

資產階級社会学里那些东西必須批判，那些东西可以繼承还需要深入討論。这种討論对于我們这些搞过資產階級社会学的人更是重要。

我具体建議，一方面我們可以从若干当前社会問題的具体研究入手，开始从实践里来建立新的社会学，另一方面我們应当學習历史唯物主义，掌握馬列主义理論工具，对資產階級社会学进行批判。要有效的进行批判工作，我想首先要將資產階級社会学的若干主要流派，系統的加以介紹。介紹时要力求符合原意，然後，严肃的，实事求是地，从立場、观点、方法各方面进行分析，明确他們錯誤在什么地方。同时，我們进行研究



工作中，也会由于我們自己受着資產階級社会学很多的影响，出現錯誤和缺点，因此，也必須不断的對我們自己的工作進行批評。我們這些旧社会学里成長的人，對自己還需要一個改造的過程，我們必須在不斷自我改造中去建立新的社会学。

社会学和其他学科的分工，也是一个今後還要深入討論的問題。比如，有人提出社会学和民族学有什麼區別？我們是否可以分別成立人口学和家庭学等学科而不必籠統称为社会学？這些問題都存在的，而且需要明确的。但是現在我們還沒有一致的看法，是不是可以留着今後再繼續討論？当然，我們並不一定要討論出了結果來了以後再進行工作。我認為不妨先在一些社会問題上分別進行工作，在工作中摸索出一些門路出來之後，再來明确這些問題。

# 人口問題研究搞些什麼

費孝通

最近劳动干部学校召开过一个关于人口問題研究的座談会，在会上陈达先生提出了一个人口問題研究的提綱，进行了討論。我在这个会上也發表了一些意見，作为一得之見，在这里提出来，供关心這項工作的朋友們参考：

我想人口問題研究可以分为四个部分，或是四个步驟：

第一是人口統計，就是調查清楚人口数量。怎样調查得清楚人口数量呢？最主要的当然是全国普查，比如1953年，我国舉行过一次全国普查，这是基本方法。但是只靠这样的普查还不够，因为全国普查不是輕而易舉的，必須隔一定年份才能舉行一次，而且普查項目不能多，比如1953年我們的普查只查清了人数，男女性别，年龄和民族。人口数量的分析还要仔細些，比如职业等等，在现在的条件下，普查的項目不宜太多，因此，要更精細了解人口数量，还要採用另外的方法。对全国普查中出現的特殊問題也还得深入研究。比如少数民族普查問題就不簡單。1953年的普查中，关于一部分少数民族还只能採取估計的办法，而且在族別問題上当时也只能採取自报自填的原則。不但貫徹时有困难，还發生包办代填的情形，而且所自报的民族是不是能作为少数民族来看，也有很多是成問題的，这些都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

除了全国普查之外，可以採取典型單位的抽样調查。只要我們抽样抽得好，很可以从此看到一般的情况。把調查範圍縮小了，項目就可以增加些。即便在沒有条件对某些人口現象作全国性的普查之前，我們也可以从这些典型單位作基础，得出比較正确的全面估計。

因此，人口数量的調查在方法上有許多問題是可以經常進行研究和試驗的。

第二是人口变动，包括出生、死亡、遷移、婚姻等等。当然两次普查的差額就可以看出人口变动，但是在两次普查之間的一段时间里發生了些怎么样的具体变动，却不容易从两个比較数字上看得清楚。因此，应当跟着人口变动隨時記錄下来，那就是人事登記。在我們中国人事登記的制度还没有确立，有些大城市是有一些登記的，登記的正确性怎样，也还没有科学的檢查，比如死亡登記中有关死亡原因就有很多地方由于沒有診斷的条件是不很科学的。为了掌握人口变动現象，就应当有几个地方先建立起完整的人事登記制度，吸取經驗，並且用这些地方的材料作为估計全国人口变动的根据。这又是一項重要的研究工作。最近提倡晚婚，但是有誰說得出我国平均的婚姻年龄？在这些很重大的有关很多人生活的問題上，我們却常常只能用常識办事，或是临时進行些突击調查，那都是不很好的。

第三是比較分析。人口的数量，加以比較分析，就可以看得出很多問題。比如比較各地方的数字，就可以看得出人口分布上存在的問題。再和資源的分布相对照，可以給我們指导人口流动的方向。比較历年婚姻的数字，就可以計算出今後人口增长的速率。比較解放前和解放後的数字，或是比較我們社会主义国家和資本主义国家的数字，可以

說明我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这些比較分析可以提供制定有关各方面政策的基本資料。比如教育上許多政策方針就必須預先知道今後入学儿童的数量。知道了入学儿童在今後十年內会增加多少，現在就得注意培养多少教师了。沒有这种科学的預見，一定会临事倉惶，無法應付。在国民經济計劃中，人口数字应当是最基本的資料。

第四是人口政策。一方面我們应当依据人口的变动来决定我們国家的許多基本措施；另一方面，我們也应当依据我們經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可能發展的速率来規畫我們人口的增长。过去不少人把人口增长作为出于人力範圍之外的自然現象，那是不正确的。也有人認為多一人必然比少一人好，並且說因为一个人的劳动必然能生产出多于他本人消費的数量，有所剩余，因此人口不必加以控制，那也是不对的。說起道理来很簡單，自从人類走出原始社会，就有了剩余产品。就拿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論，如果所剩余的为数很少，不能积累起来發展重工业，那就很难想像这个社会能进入社会主义了。我們現在要發展的不是其他社会，而是社会主义社会，那就不应当有这样簡單的想法了，应当算算賬，一个人要多少生产資料，这些生产資料值多少錢，怎样去积累这笔資金。因此，每个社会，每个时期，根据各种条件可以算出一个人口的适中数。人口增長率超过了这个适中数是会迟緩社会發展速率的。因此，必須有个人口政策。

人口政策並不簡單。除了社会經济的發展速率外，还要看到人口分布不平衡、各階層生長率不平衡等等因素，人口怎样發展才好，必須細致分析。

政策怎样貫徹又是个問題。人口增長固然是人們可以左右的，但畢竟是生理現象，而且有許多密切相聯系的思想觀念，並不能象工厂里出品一樣，要多少出多少，不要了可以停止生产。去年宣傳了“吃蝌蚪”，引起的社会效果並不是好的，而現在推广避孕藥物是否切实可行，行起来又怎样，其实都是問題。一陣風的高法，無論如何是不妥当的。这又說明必須有科学的調查研究紧紧跟着，使我們的政策能貫徹得好些。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不加以足夠的注意是不成的。

最後，我覺得劳动干部学校召集这次座談会，从科学出發来討論怎样开展人口問題的研究，以我所知道的來說，解放以後还是第一次。这应当是个良好的开始，而且应当感谢这次會議的主人。但是，這樣的規模顯然和国家的需要是不相称的。这个和国家事業密切相关的大事，决不是少数几个学者，在一兩間房里，四处乞討資料，閉門研究可以胜任的。因此，我很希望有关部門能及早認真的考慮一下，怎样把这种科学研究机关建立起來，並且創造必須的条件，把這項工作好好的推动一下。

（“新建設”1957年第4期）

## 社會學在新中國還有地位嗎？

吳景超

1956年10月19日的“真理報”上，登載了一篇蘇聯科學院通信院士費多塞也夫所寫的一篇文章，報導關於國際社會學會第三次會議的情況。這次會議，有57個國家的500個代表參加，其中也包括蘇聯及東歐人民民主國家的代表。文章中除敘述了在會議中馬克思主義者與非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鬥爭以外，在文章的末尾，特別指出一點，就是西方國家的社會學者，發表了大量的關於勞動、文化、生活、家庭、道德、都市與鄉村等問題的論文，但是這些材料，在蘇聯及人民民主國家中，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社會科學工作者沒有對於它們進行分析與批判。這一缺點，應當很快地加以矯正。

看過了這篇文章以後，又得到一次機會與波蘭科學院的奧爾格爾德·魏得志談話，他提到了參加國際社會學會會議的情形，並送給我一篇華沙大學的一位同志在這次會議所宣讀的論文。當時參加談話的，還有過去搞社會學的潘光旦、嚴景耀及雷潔瓊幾位同志。

這一切，使我想到了中國的社會學往何處去的問題。

在解放以前，中國許多大學中都設立了社會學系。1952年院系調整之後，這些社會學系都一概取消了。過去搞社會學的人，大部分都改業了。當然這不等於說，過去社會學所研究的對象，現在沒有人研究了。不是這樣的。社會學的某些部分，如勞動問題、民族問題，在我們的高等學校中，現在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機會。但是也有些部分，現在還未得到適當的安排。我在這篇短文中，只想對於這些部分的安排，提出一個初步的意見。

社會學原理及近代社會學思潮這些課程，是舊社會學的核心部分。它是歷史唯物論的對立物。資產階級的學者，以社會學的理论來與馬克思主義進行對抗。因此，整個地說來，資產階級的社會學，其立場、觀點與方法，基本上是錯誤的。但是在百家爭鳴的時代，我認為在我們的哲學系中，還有設立社會學一門課程的必要。在這一門課程中，可以利用歷史唯物論的原理，對於資產階級社會學進行系統的批判，同時也盡量吸收其中的一些合理部分，來豐富歷史唯物論。我國的歷史唯物論者，在與資產階級社會學進行思想鬥爭的過程中，也可以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

舊社會學還有其他一些部分，如人口理論及統計，社會調查（都市社會學與鄉村社會學都可併入社會調查之內），婚姻，家庭，婦女，兒童等問題，社會病態學中的犯罪學部分，都可酌量併入其他學院有關各系之內。開設這些課程，當然不能採用舊的課本，講授時也不能採取舊的立場觀點與方法。但是以歷史唯物論的知識為基礎，來研究這些問題，對於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也還是有用的。

（“新建設”1957年1月號）

## 提高民主黨派建議的質量

吳景超

自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針提出之後，民主黨派的責任更加重大了。民主黨派必須對於國家大事，不管是國內的或國際的，向我們的領導黨提出建議，作為領導黨決定政策的參考，這是一件繁重的但是光榮的工作。

社會主義的民主，有一個特點，就是黨和政府制定一種政策或者採取一種措施的時候，總是以全體人民的利益為出發點。人民的利益是什麼。黨和政府對於某一問題，應當採取什麼辦法，才最符合於人民的利益，必須總結羣眾的意見與經驗，才能得到正確的解答。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各民主黨派是參與國家大事的。領導黨對於每一重要問題的決定，總是要事先與各民主黨派充分洽商的。民主黨派的意見，歷來是受到領導黨重視的。但是過去民主黨派在向黨和政府提供意見時，還缺乏充分的調查與研究，對於集中民主黨派內部羣眾智慧的工作，也做得不夠，這就使民主黨派所提出的建議，還不能達到適當的質量水準。

為了矯正這一缺點，我們建議在各民主黨派里面成立政策研究委員會，對於國家大事進行有系統的調查研究。這一類的政策研究委員會，可以斟酌各民主黨派成員的性質，設立一個以至幾個。譬如以中國民主同盟來說，對於國際問題，經濟建設問題，知識分子問題，文教政策等問題，都可以設立政策研究委員會。委員會的成員，以盟員中對於這些問題有興趣有研究的人充任。他們可以有計劃地對於一些問題進行經常性的研究，也可以在某一時間集中精力研究領導黨所交下的問題。研究的結果，可以通過組織的適當途徑，向領導黨及政府反映。我想，經過一些專家研究後再提出來的意見，質量是可以大大提高的。這樣做，可以發揮民主黨派成員的內在力量，可以吸收民主黨派廣大成員，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對於迅速完成我國過渡時期的總任務，是有很大貢獻的。

這一工作如要做好，除了各民主黨派的組織方面，必須進行適當的改革外，我們還希望中國共產黨對於這一工作，加強領導。有一點是特別重要的，就是希望中國共產黨，對於國內外發生的重大問題，隨時供給各民主黨派以足夠的資料。沒有對於反映客觀存在的大量資料進行細密的分析，就隨便提意見，提建議，是會經常脫離實際的。一個孤陋寡聞的人，信口開河縱談天下國家大事，是經常會鬧笑話的。為要避免這種缺點，各民主黨除了自己要加強調查研究的工作以外，希望中國共產黨對於這方面多加協助。

（“政協會刊”，1957年2期）

## 在國家統計局召開的座談會上的書面發言

吳景超

茲將個人對於統計局工作，提出幾點意見，作為參考。

(1) 國家統計局過去所搜集的資料，多在保密的招牌下凍結起來，以致人民對於這些材料，無法利用，實為一大損失。統計局的內部資料，幾乎全部可以公開，而不會為國家招來損失。(個人意見，除國防及外交資料外，其他都可公開)現在對於公開這些資料的障礙，是思想上的障礙。即若干領導，思想中還存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封建殘余。(我不說是資產階級思想殘余，因為在資本主義國家內，我們所說的許多保密資料，都是公開的)這就造成在人民內部，有一部分人處於非常有利的地位，他們看得到這樣或那樣的資料，而另一部分人則什麼資料也看不到。我建議，首先把統計局內部人手一冊的那本統計手冊，整理付印，然後把內容逐漸加以豐富，使全國人民，都可享受統計的果實。

(2) 國家所公布的統計，應逐漸取消相對數字，增加絕對數字。如“統計工作”第九期所公布的第一季度國民經濟簡況，都是相對數字，可以說是價值很少，或者可以說全無價值。譬如說，電力完成計劃的99.4%，對於老百姓來說，這個數字有何意義？99.9%的老百姓，看不懂這個數字，只有那些少數主管電力生產的人，才懂得這個數字，但是他們根本不需要從統計局得到這點知識。假如這個數字用絕對數發表，如發電若干度，意義就大得多，很多老百姓也都看得懂。利用這個絕對數，老百姓可以根據自己的要求，算出不同的相對數字。因此，我建議，以後統計局發表的數字，最好是原始的絕對數字，不必加工出一個相對數字來，使老百姓看了莫明其妙。

(3) 國家統計局每年發表的公報，時間太遲，應爭取上一年的總結數字，於下一年一月底與社會見面。至遲不要在二月底以後。

(4) 國家統計局與高等學校的聯繫，1956年起已有改進，但還可以合作得更密切些。是否可以考慮建立一些經常性的或暫時性的研究小組，在小組中，既有統計局的專家，也有各校的教學人員，有些學術性的問題，可以先在這些小組中加以討論，提出具體辦法，作為行政上的參考。這樣，對於教學與統計行政，都有好處。譬如統計方法，指標體系等等，都可設立經常性的研究小組。

(5) 地方上的統計人員，應加充實，否則地方上報的統計，質量難於提高。以後分配大學生，可以多考慮一些地方上的要求(特別是省市一級)。更好的辦法，是把國家統計局的專家，下放一些，同時把分配來的大學生，在業務實踐中培養若干年後，再行分發到各省市，使其擔任一部分調查研究工作。這樣，就可把地方上的統計質量，逐漸提高起來。

(“統計工作通訊”，1957年第12期)

## 一些可以研究的社會現象和問題

吳景超

过去的社会学原理所研究的对象，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所研究的对象，只是研究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有所不同。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学原理可以不必要了。可以开一门近代社会学思想史，来代替社会学原理。在这一门功课里，介绍并批判自孔德以来，欧美各个社会学派研究的成績及其錯誤之点。除此以外，还有若干社会现象及問題，可以在社会学系或社会学专业中講授。

第一，人口問題，在历史唯物主义教学中只講一小时，这是很不够的，应当拿出来加以充实。

其次，婚姻、家庭問題，虽然恩格斯对这一門学問很重視，而且还写了一本专著，但是現在通行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書中却講得很少。社会学可以来研究。現在法院中离婚案層出不窮，兒童問題也很严重，需要进行研究。

第三，城乡关系，这里包括着工人、农民、知識分子之間的关系，上層建筑与基础之間的关系。这就是过去的“都市社会学”和“乡村社会学”所研究的，可以和社会調查結合起来。过去的社会調查，搜集材料不少，但是分析不够，因而不能發現事物变化的規律。

第四，社会問題中，如民族問題，已有专门机构进行研究，但除此以外，还有犯罪問題，劳动問題，住宅問題，生活費用及生活程度問題等等，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还有宗教社会学，法律社会学，知識社会学等，过去中国也没有搞过，我看将来也可以搞搞。

# 李景漢企圖篡改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調查 研究室政治方向的陰謀

——鄒魯風副校長的發言節錄（1957年7月20日）

在發給大家的反右派鬥爭的小冊里第71頁，有一個“社會學工作籌備委員會”關於恢復資產階級反動的社會學，成立“社會學工作籌備委員會”和陰謀篡奪中國人民大學調查研究室的方案。

對於我來說，這同樣是一個相識已久的東西。自今年春天以來，我也不只一次地從吳景超、李景漢那里“領教”過和無數次的鬥爭過了。

這個方案，像上面的“意見”一樣是一個右派分子陰謀復辟資本主義，篡奪黨的領導的罪惡活動的組成部分。

對於這個反動綱領，我不想作仔細分析，主要的想着重介紹一下有關我們學校的部分。因為這是我親身鬥爭過，比大家更熟悉些。說明一下，對大家了解右派分子的陰謀的內幕，和認識右派分子吳景超、李景漢等的真正丑惡面目會有幫助。

在6月9日右派分子吳景超、李景漢、費孝通等人在陳達教授家里開了一個會，叫作：“社會學工作籌備委員會”。在這個會上他們討論通過了這個反黨、反社會主義和篡奪人民大學調查研究室的反動方案。這個反動方案首先是關於成立“學會”和規定“任務”。

（一）關於本會名稱和任務：

“名稱：社會學工作委員會，隸屬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推陳達擔任主任委員。”

這裡我要向吳景超先生請教一個問題，即你們這個“社會學工作委員會”既然“隸屬科學院社會科學部”，你們事先征求過科學院的同意，經過科學院的批准嗎？我懷疑你們是在開黑店，干着反動的資產階級社會學的走私勾當！你們的“委員會”，既然隸屬科學院，為什麼又私自選舉陳達為主任呢？你們有什麼權力替科學院作決定？你們簡直是猖獗到極點——目無政府，目無法紀，儼然成了科學院的“太上皇”！

這些問題，我們沒有向科學院調查過。吳景超先生最好請你解答一下。

下面我想着重談一下吳景超、李景漢等右派分子篡奪人民大學調查研究室的陰謀。上面有的同志在發言里說：中國人民大學調查研究室的成立是由于民盟的建議。這是不符合事實的，至少是不完全合於事實的。我這麼說，並沒有絲毫責難剛才發言的同志的意思，因為我知道他不了解全部情況。我校醞釀成立調查室，遠在去年下半年已經開始了，民盟的建議遠在這以後了。

事情的開頭是由于高教部楊秀峯部長的議建。在去年下半年有一次我和胡校長到高教部開會，楊秀峯部長向我們提出了這個建議，以後我去開會他又一次提到這個問題。他說：人大都是社會科學的專業，為了使教學和科學研究工作更好的結合實際，應該多作社會調查，同時，他要我們考慮建立一個專門的社會調查的機構。胡校長和我認為楊部長的意見是很正確的。不久就在黨委會提出討論，並決定成立調查研究室。接着在校行



政會議上也提出討論並作出同樣的決定。今年春天就开始了籌備工作。我因為在分工中負責科學研究，所以調查研究室的建立也就一直是我負責。因此對其中的曲折鬥爭也了解的最清楚。

首先是在幹部配備上的鬥爭。其次是在工作方針和工作計劃方面的鬥爭。其他小的方面當然還有。在幹部配備方面我們首先調了兩個室主任。為了發揮“老教師”的積極性和“所長”，我們決定以李景漢教授（那時他的反動政治面目還未完全暴露）為主任；而為了掌握政治方向，決定唐垠同志（黨員）為副主任，另外又調了幾個教員。鬥爭也就是從此开始了。一方面李景漢不斷向我提出，要吳景超來擔任室主任，另一方面吳景超也不斷向我提出工作計劃的建議：“對北京市作全面調查”——他並且三番五次地向我提出：某年某個外國人在北京只住了兩、三個月回去就寫了一大本北京調查，另外也舉了不少英、美的例子。

對於李景漢再三推薦吳景超作室主任的建議我也是再三婉言謝絕了，對於吳景超的北京市全面調查的計劃，我則認為是力不勝任的，因為我們的調查不同於資產階級的“學者”寫書賣錢的商品買賣，因而必須實事求是地從小到大，從點到面的來作，老實說，當時吳景超等右派分子的反動面目雖未像今天這樣明顯，但對於他以及在他影響下的民盟支部的進攻，對於他想抓取一切權力的“扒手”，我是存有戒心的，當然，今天看來，我當時對他們的警惕性還很不夠。

至於李景漢和我們之間的鬥爭也是一直未斷的，除了吳景超作主任的問題上的鬥爭，還有關於調查室的兩個秘書（負責資料保管，對外聯繫，兼作李景漢助手）的人選上，首先他提出了條件是：一男一女，能操北京口音。我答應了，按這樣條件在校內物色。在物色人選過程中，我挑選了幾個人，要他考慮，他認為不能同意，不久他提出“合適”的人選來了，一個是外國洋行干過多年的職員，歷史非常複雜；（男的），一個女的據說是山西某機關衛生所的一位司藥。但是我不同意他這個選擇，因為第一，國務院有命令不許增加編制；第二，調查研究室要掌握資料，工作有一定的保密性，人選必須在政治上可靠，而李所選的人是不合這樣要求的。於是李景漢軟硬兼施地來展開鬥爭了，他除了再三向我要求，並舉出陳述自己選擇助手的先例，堅持他的意見，同時在下面揚言：如果不答應他自己選擇的“得力的”“金童玉女”——因為他要求這兩個人要兼作僕人來侍候他，而這是黨、團員所作不到的，他的堅決拒絕黨、團員作他的助手，當然還有別的不能說出的理由。對於他這種無賴手段，有一次在唐垠同志房內遇到他，我曾公開批評他：請他不要因為一點小成就，（那時他發表了調查報告、他的同伙，也有不大清楚真情的我們自己的人為他大肆鼓吹捧場——這裡附帶說一句，人民日報登載的李景漢訪問記也是很惡劣的，也是極盡歪曲的能事：把李景漢盡量描繪成受委加的莊嚴的“學者”，而把人民大學領導人，其中也有我，則盡量往鼻子上抹白粉，畫作趨炎勢的小丑形象。對於這，我們只是由於不久即忙於整風，才暫時容忍了。現在希望人民日報也能有所檢查。）就擺起架子來！我還引用了魯迅先生的話來勸告他：擺教授架子是不好的。我當時對他的批評還是同志式的，誠懇的。雖然內心裡也不無警惕。

但是，現在看来，对于吳景超，李景漢等右派分子，我的警惕还很不夠，我还是把他們的“优点”看得太多了，而对于他們的透徹骨髓的反动本質，則估計十分不足。我們要李景漢担任調查研究室主任，是要他真正能夠發揮“所长”和積極性。为此，我曾多次登門拜訪，又曾亲自和他到過鄉間，了解他的調查工作情況，幫助他解决工作上的一切条件。然而，李景漢却是“包藏禍心”，俟机复“仇”，勾結他的“一丘之貉”，“狼狽为奸”企圖篡夺調查研究室的領導权，把它完全变質为服务于資產階級右派向党进攻，陰謀复辟資本主义的基地。請看！这羣右派分子在背後商量些什么！

“乙，城乡社区調查研究，拟暫由人民大学社会調查研究室負責与科学院合作。开始北京市进行調查研究工作

1、調查研究工作的具体領導由人民大学調查研究室負責，經費由人民大学負責，有需要时經費由科学院酌量補助；本会酌量派研究員、研究助理参加工作。”（見小冊子73頁）

这里不仅仅替人民大学作了决定，也替科学院作了决定。胆大妄为的右派分子，你們有什么权力这样做？

几次为我拒絕的吳景超的北京市全面調查計劃在这里又端出来了。吳景超你对北京市的全面調查如此坚持，究竟是何居心？

你們不仅要人民大学調查研究室变質为替你們右派分子服务的机构，而还要人民大学負責你們的反动活动的經費！你們的“如意算盤”可真打得不錯。可惜，你們是“利令智昏”把情况完全估計錯了，共产党沒有你們想像那么變，人民大众也絕不是你們希望的那么糟。他們在整風的同时也在警惕着你們的頻頻伸出的政治“扒手”！你們的臟污的“扒手”，已被大众牢牢地抓住了，掙不脫的！

“2、調查計劃由人民大学調查研究室提出。推李景漢、吳景超、趙承信負責草拟。本会参与研究，由人民大学与科学院共同决定。”（見小冊子73頁。）

請問：“調查研究計劃由人民大学調查研究室提出。”是誰批准的？你們有什么权力作出这样决定？你們替科学院作决定，科学院是否事先已經知道和已經同意我不知道。但是人民大学調查研究室从来不曾委托过你們；对人民大学調查研究室你們絲毫沒有作这种决定的权力，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你們又私自推李景漢、吳景超、趙承信負責草拟你們的“調查計劃”。是誰推舉你們的？你們究竟計劃干什么？为着什么目的？你們必須老实交代！趙承信先生如果也参与了謀劃，也必須全部交代！

同志們！从这个反动綱領中，我們又一次看到右派分子的陰謀是無孔不入的。他們的手法就是兩面派，欺騙詭詐，軟硬兼施，他們的目的就是夺取党在各方面的領導权，使資本主义在国家各个領域复辟。他們对于党、对于社会主义是極端仇視的。李景漢在教師座談会上公开罵党：“左手拿着馬列主义，右手拿着苏联武器”；“要求黨員多一点人性”。右派分子对党、对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苏联的仇視，真是鏗心刻骨的深刻。李景漢的切齒漫罵，正是代表他們一小撮右派分子的真正“良心”。

讓我們以毛主席所提出的六条标准來給他們一个个衡量一下吧！他們真是六害俱全，反动透頂。

## 在國家統計局召開的座談會上的發言

李景漢

國家統計局我只來過兩次，接觸機會少，知道的事情也不多。今天的發言可能不符合實際情況，甚至抓不到痒處。過去思想改造運動時，常用“有則改之，無則加免”這句話來阻止別人的辯解。今天的情況不應該是這樣了，如果我說錯了，統計局可以辯解。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 宗派主義：統計局可能有宗派主義的表現。例如，在過去對於統計調查等工作在計劃和準備的期間，據我所知，很少找過去的一些有經驗的專家參加討論；國家舉行1953年人口普查時，也沒有邀請我國具有學識和豐富經驗的人口學家，例如陳達先生等參加工作。過去幾年，統計調查和幹部培養工作方面缺乏與他們之間的聯繫，並且沒有一個統計調查的正式組織。對這些方面今後應適當的加強聯繫，才能擺脫宗派主義。

(2) 教條主義：建國以來處處以蘇聯先進經驗為標準，這是好的，必要的，也培養了不少幹部。蘇聯的統計報表制度的優越性很大，但要解決我國多種多樣的社會經濟問題，除了報表制度這一武器以外，還有多種多樣的方法技術。報表制度不是萬能的，在我國，除報表制度外，不妨採用適合我國情況的各種方法，以補蘇聯經驗和報表制度的不足。

(3) 保密制度：國內從事學術研究者由於嚴格的保密制度，不易看到和使用新的統計資料（當然人民大學能夠看到一些，算是例外）。應當在不違反國家政策的前提下，放寬保密限制，使大家能得到和使用資料。

(4) 對資本主義國家統計調查方法缺乏應有的注意。近十年來，我們不了解資本主義國家統計的發展情況，因此在批判時不能打中要害，說服力不強，同時，我們也不能充分吸收他們在統計技術和理論方面值得注意的東西。

(5) 對我國近代統計資料缺乏系統的整理，這當然不局限于統計局，例如，科學院在這方面做得也不多。對國外統計資料注意不夠，未能充分介紹到國內來，使大家對他們感到陌生。這樣就切斷了國外社會經濟情況的聯繫。今後應適當的注意到這一方面。

開展這些工作，必須聯合國內的一切力量。這對國家統計局、國家調查工作都有好處。

（統計工作1957年第12期）

## 開展對家庭、婦女等現實社會問題的調查研究

李景漢

近來注意到一些我們過去研究社會學的人現在能夠做的一些事情，也就是別人來搞而給我們所留下的一些空白，而這些空白是與人們的實際生活大有關係而值得調查研究的。

不久前，我曾在北京近郊做了一個小規模的調查，即關於農民生活三十年來的變遷的研究。現仍在繼續做規模大些而比較深入的調查，不但在物質生活方面，也擴大到他們的精神生活方面。在調查中就理會到農民家庭成員間相互關係和家庭的大小正在改變——大家庭慢慢的改變為小家庭。但是一般的仍舊是縱的方面三代人生活在一起，在橫的方面兄弟也生活在一起。很顯著的他們越來越和睦的生活在一起了。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逐漸平等。不過，其間問題還是很多。例如，全家內的成員都加入或大部分加入了農業生產合作社以後，每人都掙工分，各人有個人的收入，當然青壯年比老年人收入要多些，青壯年變成家庭中的重心，而不是昔日以老年人為家長或是家庭中主要成員了。因之，有些家庭的壯年成員覺得老年的父母是成為家庭中的負擔了，而願意把老年人分出去，使其另過，這樣使自己的小家庭過得更舒服些。換言之，老年人有越來越被輕視而不被家庭照顧的趨勢。

這也是由於對不能生活的老年人有“五保”來照顧他們的規定所引起的。當然，老年人就不免發生苦悶了。這使我們不能不問：大家庭制或一種不大不小的、三輩人同居的折中的家庭制，而使老年人在家庭中貢獻其經驗，青年、壯年貢獻其新的知識和能力與進步的理想，這樣把三輩人同居的家庭制保存下來，是不是與生產和家庭幸福更為有利？是個值得進一步調查研究的問題。

在农村中，由於農女參加了勞動，她們具有了經濟獨立的能力，家庭成員間的相互關係比從前好得多了。但有很多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例如，父母和子女之間、婆媳之間、以及其他每兩個成員之間的相互關係的現狀和問題，都是需要研究解決的。

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婦女從事家務和到外面工作的問題。當然，婦女和男子一樣參加家庭外的勞動，在原則上是很正確的，也是必要的。但目前在各種階層家庭中的很多婦女參加了勞動，和男人一樣的勞動，但也有不少婦女爭取參加勞動，是很勉強的，自己並不感覺愉快的。這樣就發生了一種現象，家庭中的子女和家務交給保姆照顧，或把子女送入托兒組織。每天全家匆匆忙忙地在白天去參加工作，晚上回家團聚。往往子女和父母是很生疏的，甚至少見面的。很顯然，家庭的性質和它的作用改變了。有的家庭變為“旅館式”的家庭了。子女不是由父母教養了，而家務由保姆來做了。似乎認為家務不是重要的勞動，只有家庭外的勞動才是真正的勞動。這樣有的婦女有輕視家務的現象。這種家庭變質和子女所受的影響，是值得注意的一個社會問題。如何使家庭成為一個正常的、健全的人類家庭？如何使婦女不太忽視子女的教養和安排家務這一個婦女所

專長的重要責任？是否婦女一定要在各方面爭取和男子一樣的勞動？這是需要細致、認真的調查研究的。

还有一点：对于过去所做不少的調查研究，有从事整理、分析和評述一下的必要，看究竟有什么遺產可以繼承下来，其中有哪些值得吸收的东西。

此外，还有种种的、有现实意义的專題調查，都是需要有人来做的。因为这就能夠补足我們从蘇聯所学的报表制度所留下的空白。报表制度的調查好像是望遠鏡的調查，鳥瞰式的看到全國社会現象的全貌。我們可以在某些社会現象从事顯微鏡式的、X光透視式的、比較詳細与深入的質的方面的專題調查研究，或是抽樣的或是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調查研究。这很能补足純靠报表制度之不足。一方面不致見林不見木，一方面不致見木不見林。两方面取長补短的配合是很需要的。

还有，在一个地点舉行一个綜合性的全面的社会調查研究，把一个地方各方面的社会現象做相互聯系的整个研究，也是在报表制度以外的一种有意义的調查研究。当然我們要以新的观点和方法来从事这种學術工作。

总之，个人認為社会学所要研究的主要事項是人与人間的相互关系，包括人民内部相互关系間的种种矛盾問題。我相信，經過解放後的学习和鍛鍊，我們已經都成为唯物主义者。我們所要的也是唯物主义的、無产阶级的社会学。我們所要从事的工作，也是要根据中国社会特殊性質，來实事求是的、客觀態度的从事有关生活的具体研究。不受唯心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害处，这样不但能夠把新中国的社会学發展起來，也一定能夠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論和内容丰富、充实起来。

# 社會學與人口問題研究

——與陳達教授一席談

文匯報駐京記者 劉光華

了解社會發展一般規律以外，現代社會生活問題也急需加以研究。

“首都學術界近來對於社會調查研究工作和人口問題很感興趣。您是這方面著名的專家，是否可以談談對這些問題的看法？”記者問陳達教授。

“目前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種種問題，沒有人來系統地進行科學的調查研究，”陳達教授說，“這樣，在學術領域中就形成了空白，並為國家的工作帶來了很大的損失。所以現在大家開始注意到這些問題是十分及時的。”他說，社會問題是和現實社會緊聯在一起，無法分割開來的。各個社會都有它不同的問題。因此我們除了研究歷史，了解過去的社會及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之外，還必須對現代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問題，進行廣泛的調查、分析，並提出解決的辦法。象人口、兒童、婚姻、家庭、婦女、城市、鄉村、犯罪、移民等問題，都是很複雜和牽連很廣的，而在新社會中，由於生產關係的改變，引起了種種變化，又產生了許多過去所沒有的新問題。就拿城市問題來說，北京市付市長張友漁不久前便在市人大會上說過：北京市當前市政上所發生的種種困難，主要就是由於幾年來市內的人口增加得太快。很顯然，這問題也不僅是北京一地而已；今後，隨着國家工業化的發展，各城市人口勢將繼續不斷地增加，市政的問題自然也就愈來愈棘手。怎麼來妥善的解決呢？那首先就需要好好地進行一番調查研究。還有，農村問題也提到日程上來了。我們的農村在全國農村合作高潮之後，除了經濟方面的變化之外，人民的生活以及彼此間的關係也隨之發生了顯著變化，也需要來摸摸底，作一番系統的調查和研究。

陳達教授指出，一方面有許多社會問題急需人來進行調查和研究，另一方面又有不少訓練有素的專家閑置在那裡，或是在做着不適合他們的專長的工作。陳先生很激動地說，1952年院系調整決定取消社會學系時，他是堅決不同意的。因為社會學的理論果然有許多錯誤的地方，當然需要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基礎上來徹底進行改造，但決不等同於一無可取，必須“連根拔除”。中國過去搞社會學的人一向注重實地調查的工作，積累了豐富的材料和成套的行之有效的辦法和經驗。由於社會學系被取消，過去一批搞社會學的人多數改行干別的工作。其中就有許多是改得頗不合适的。象人民大學的李景漢教授，幾年來改來改去就沒有了一個確定的專業，孫本文教授在南京大學重起爐灶，另開別的課程，史國衡教授則完全脫離了教學崗位在清華大學辦起總務。這實在是對國家人材的一種浪費。

人民日報於2月2日發表了李景漢教授一篇題為“北京郊區鄉村家庭生產的今昔”的調查報告，受到各方面的重視與好評。陳達教授有點感慨地說，李景漢教授在這次調查中所用的，正是最典型的社會學的方法；而象李景漢這樣水平的專家，在過去搞社會

学的人中間是並不在少数的。

主張成立社会問題調查研究所，在大学开講社会学

因此陈达教授主張，应从速在中国科学院里成立社会問題調查研究所，集中全国現有的研究人力，展开大規模的調查研究工作，並制定社会問題研究的规划。同时，为了訓練培养年輕的接班人，应立即在各綜合大学或是財經学院中恢复社会学系，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系統地、邏輯地講授社会学，特別是“应用社会学”（如“社会調查”等）則不妨先行开課。

至于过去許多与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不符的社会学学說，陈达教授認為也应当講授。他主張应从速把古典的社会学名著选譯出来，因为这些都是历史遺產，其中固然含有糟粕，但也有不少值得汲取的好东西。並且，縱使是完全反动的学說，也应使大家知道它的內容實質，以便于分析批判；这样才符合我們百家爭鳴的精神。陈达教授說，我們不能把过去的一刀割断，任何社会科学都是逐漸形成而不是从天而降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論也是在批判資本主义的过程中，取其中有价值的部分而丰富了自己的內容的。



## 請問高教部：爲何取消勞動專業？

勞動問題在任何社會里都是一個關係着生產與生活、領導與羣衆、個人與集體的重要問題。因此在蘇、德、朝等社會主義國家，甚至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都有關於這方面的深入而又具體的研究，同時也十分重視着這方面專門人材的培養。但唯有我們解放了的新中國，勞動科學在高等學校中則是走着一條從大到小、從小到無的道路。

解放之初，在全國許多綜合大學中（如清東大學、燕京大學、雲南大學、輔仁大學，中山大學、華西大學、復旦大學等）都有勞動系或社會系勞動專業之設。但自從1952年高等學校院系調整以後，勞動專業隨着社會系被不問情由地粗暴地取消了。只是由於過去從事勞動問題研究者的建議和堅持，才在中央財經學院內設立一個兩年制的勞動專修科。1953年勞動專修科併入中國人民大學，改爲二年制調訓干部的勞動經濟專修科。到了1955年8月，高等教育部和中國人民大學不顧勞動經濟專修科全體教師的反對，採取了強制的官僚主義的手段，把這一個全國絕無仅有的勞動經濟專修科也堅決取消了。因此許多過去從事勞動科學教學工作和研究工作的人不得不紛紛改行了。現在剩下的，只有北京勞動干部學校中輪訓干部的一個一年制的勞動經濟班和勞動保護班。

高教部爲什麼硬要把勞動專業在高等學校中的地位堅決取消呢？據說有以下的理由：第一，勞動專業沒有科學體系；第二，當時的蘇聯顧問不了解勞動專業；（人民大學胡錫奎副校長在“歡送”勞動專修科教員的會上就曾說過：“蘇聯顧問不清楚的事咱不敢辦”）第三，人大已有工業經濟系用不着勞動專業。

我們覺得高教部和中國人民大學的這三點理由的實質是和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分不開的。（注：原稿是：三點理由的實質就是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第一，不信任過去搞過勞動科學的專家，所以認爲辦勞動經濟系沒有條件。但是在勞動專修科取消的同時，却在人大辦起來檔案系和新聞系。請問他們的條件又在那裏？這不是宗派主義又是什麼（注：原稿還有：“至於當前我國建設中的勞動問題，那是另一回事，與我高教部無關”這一句）？第二，蘇聯有的，咱們就辦；蘇聯沒有的，咱們辦了豈不要出亂子？高教部這種主觀、教條和關門主義簡直令人不能容忍。第三，認爲人大嫡系的工業經濟系可以壟斷勞動科學，有人並沒有深入鑽究勞動經濟，就說勞動經濟沒有存在的必要。（注：原稿是：有人對勞動經濟一點不懂，就信口開河說勞動經濟沒有存在的必要）在高教部和人民大學這種歧視勞動經濟的態度下，勞動經濟專業自然無法發展了。

當整風運動在全國範圍內波瀾壯闊地开展起來的時候，大家的覺悟提高了，看法改變了，我們有必要大聲疾呼，請高教部重視勞動科學的地位問題。

爲了开展有關勞動問題（如勞動報酬、勞動力調配、勞動保護、勞動競賽、生活福利等問題）的研究和專門人材的培養，我們建議高等教育部立即（注：在此原稿還有：“在高等學校內恢復勞動經濟專業，馬上”這幾個字）召集過去搞過這門專業的人開一個座談會，討論在高等學校中恢復勞動經濟專業的办法。（原稿還有：這樣作，在今天

不但必要而且可能，因为劳动专业一不需要大量设备，二不需要重新培养师资，所要的只是高教领导方面解决思想问题。）

陈 达 苏汝江 单振英 袁 方 任扶善 张绪生

通讯处：西单辟才胡同南太常寺12号陈 达

## 趙文璧在民盟支部擴大整風座談會上的交代

7月5日

我于2月27日下午去看吳景超，他要去開會了，先問我“羅是否要你來看家？”然後為我開了陳達和李景漢的地址。

陳達處我去過二次，談了5個問題，（1）人口問題，他談吳景超的文章有兩個缺點（文登新觀察）；（2）節制生育問題，涉及青年報編輯曾訪他，說有一個共青團員給報寫信說每遲婚就要再革一次命，又說周總理說，聽說某地方遲婚說後結婚增多；（3）建立無產階級社會學，我說我不同意吳景超及蘇聯阿爾巴托夫的意見，我認為社會主義發生了新問題，如人口問題，婚姻問題等，而歷史唯物主義及政治經濟學對這些問題熟視無睹，舊社會學者應該研究一番，向政府提出建議。就感到要恢復社會學，陳認為有些舊方法仍可以用，意思就是說，馬列主義並不能說服人，還是需要一些舊的社會學；（4）黨的領導問題，他說是，現在是一窩蜂，中央有什麼下面就有什麼，中央指示下面不敢有別的想法，我說容易犯教條。又談到雷海宗的文章馬列主義停止在1895年，人民日報曾加按語，陳認為按得不合適，影響大鳴大放，我說人民日報是有立場的；（5）減少人浮於事的問題，動員機關中不稱職的幹部回家，涉及老干部的家屬，我想寫文章（高崇民亦同意），陳表示同意，並叫我參考蘇聯的做法。我又將這篇文章給李景漢看，他說很好，羅請他吃飯，對他啟發很大，人大對他的照顧他很高興。

## 右派分子趙文璧的

### “無產階級社會學大綱”

这是森林工業部右派分子趙文璧所拟的关于無产階級社会学大綱草案。在章羅聯盟揭發後趙文璧受到批判時說：“以後不再跟着羅隆基搞政治，准备离开森林工業部，專門去研究無产階級社会学”，並且說，已約好了几位友好（吳景超等）共同从事這項事業。这是他写的研究大綱，特印發供研究参考。

#### 關於建立無產階級社會學的大綱

（一）旧的資產階級社会学分为四類：

（1）理論社会学，如文化学派，民族学派，生物学派等。

（2）實踐社会学，或实用社会学，如都市社会学，鄉村社会学等。

（3）社会学研究法，如个案研究法，綜合研究法，統計研究法，抽樣研究法等。

（4）历史社会学专談社会發展，社会变遷，社会意識形態，學術文化文明之發展等。

（二）旧的社会学出發于改良主义的观点，着眼于补資本社会之缺陷，作用在于維持腐朽的資本主义的旧社会制度。阻碍新社会的成长，並經常有意識地攻击历史唯物主义，故是最反动的。有些說法，一是即知其为反动，容易辨別，旧的社会学标榜用科学方法，研究现实問題，有一套所謂理論，故最能迷惑人，故其反动本質最甚。

（三）無产社会学的理論基础是：

（1）根据社会主义的需要。

（2）从辯証唯物与历史唯物的革命观点出發。

（3）着眼于解决目前的现实問題。

（4）对新社会起推动作用。也即对社会起進步作用。

（四）目前一般对社会学的說法，應予批判。

（1）吳景超說：“在哲学系中，还有建立社会学一門課程的必要……可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对資產階級社会学進行系統的批判。同时也尽量吸收其中的合理部分，来丰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說法不对，原因是：資產階級的社会学並無可取之处，故是抱殘守缺的說法，目的在于复活旧的社会学。

（2）王庆成說：“無产階級社会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这說法也並不完全，因为新的社会学可以包括历史唯物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並不包括社会学，也不等于新的社会学。同时新的社会学並不包括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内容。如历史唯物論，一般談历史

的規律性和人的自覺活動，自由與必然性，國家和法權等，便不是新的社會學的內容，特別是關於民族解放與殖民地民族運動等，也不屬於新的社會學範圍。

(3) 蘇聯哲學雜誌上載阿爾馬托夫：“論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學經驗主義趨向”上，把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關係，社會產品的分配，交換和消費，對勞動的物質鼓勵，和精神鼓勵，生產者之間的同志式的互助與合作，社會主義競賽說成是新的社會學的內容。這說法也有問題。有大部分是屬於政治經濟學的範圍，不應侵犯，侵犯了是重複。他又說，新的社會學要由歷史學家、地理學家、哲學家、經濟學家、法律學家來共同研究。這說法也不對。這些人應該相互合作是對的。但並不是來共同負責新的社會學的內容的研究；這些人的每一種研究成果，都有助於新的社會學的內容的充實，但不是他們的全部研究都是新的社會學的內容。他把具體社會研究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偉大原理的牢固基礎，以及把社會主義的社會的生活方式、文化、家庭和人口，統計學也作為新的社會學研究的對象，卻是對的。

(4) 王韻愚把舊的社會學課程的開設作為繼承舊的社會學的有用的一面，也有其片面性，未能接觸到本題。

(五) 新的社會學的具體內容是：

(1) 關於社會思想的收集，整理與分析，這裡自然有批判，有否定，有繼承，有發揮，有改進補充。

(2) 關於目前現實社會問題的發掘與研究，此是重點，但必須與一般性的經濟問題與政治問題分開。（如家庭、婚姻，人口，城鄉互助，城市建設）。

(3) 關於研究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的討論與實驗。但必須弄清新的社會學與政治經濟學，歷史唯物論，百科全書，酬世大全的區別與聯繫，特別是政治經濟學與歷史唯物論。根據唯物辯證法的原理，對舊的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如個案法，訪問法，綜合法，抽象法，統計法等加以分析應用。特別注意使用新的方法，如典型先進，運用運動來進行社會教育，提高人民政治覺悟的規律性與系統的步驟與方法。

(4) 根據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政黨）法律（政府）與社會道德（人民團體，包括民主黨派）的一致性，進行適當的分工與配合，今後不兼職為主，學校與研究機構，社會活動家（即民主黨派與人民團體的活動分子），與政府適行分工合作，社會活動家根據社會活動的經驗與實際情況，提供學校與研究機構以資料。學校研究機構根據這些資料進行綜合、調查、分析研究，提出一些解決問題的办法，提供政府（或領導黨）採擇執行；掉過來，政府執行的情況與在執行中發現的新問題，又交學校或研究機構去研究，學校或研究機構也給社會活動家提出新的問題去實踐，如此往復，可以使社會上的實際問題，得到及時解決，且有理論根據，又可及時總結，隨時改進。

以上僅是個人一時主觀見解，也僅是一個粗糙的大綱，需要提出於全國各研究社會科學的人來討論，改正、補充。有一點必須說明，一般人容易把社會科學與社會學混為一談，根據我的看法，不是一件事，社會學是社會科學中的一種，而不等於科學。社會

科学中任何一学科目的研究成果，都是社会学研究问题时的最必要的资料与理论根据，但社会学并不直接（也不可能）去研究每一种社会科学中的科目，社会学等于装配厂、社会科学等于千千万万的专业性的机器厂。

（此大纲系赵文璧七月底交出）

## 社會學政治學需要發展

上海有關學者認為應即恢復這兩門科學的研究

【本報訊】上海從事社會學和政治學的研究工作者，前天分別舉行座談會，就如何在社會學和政治學領域內貫徹百家爭鳴方針，交換了意見。

社會學、政治學在新中國有沒有發展的前途？到會的人對這個問題都作了肯定的答復。王造時認為，新社會里既然有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社會學和政治學就應該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缺了社會學和政治學，就要影響其他科學的發展。劉威說，社會上發生的一系列問題，如人口問題、婚姻問題等，都需要社會學來加以解決，所以社會學就有發展的必要。彭文應說，解放後，我們對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情況了解得很不夠，這種情況不能長期存在下去，政治學應該作為一門科學來進行研究。

很多人認為，過去領導上對社會學、政治學採取一棍子打死的粗暴態度，是不對的。王養沖說，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時，撤銷了社會學系，使得大批教師無業可務，這是一個很大的損失。平心認為，過去領導上用行政命令的辦法對待科學，是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狹隘的功利主義在作怪。彭文應說，過去對待資產階級的學說一律加以否定，結果連其中好的東西也拒絕吸收，這種損失是無法估計的。應成一說，我過去研究了半輩子的社會學，解放以後，高等學校撤銷了社會學系，心裡很苦悶。幾次調動工作，真有“隔行如隔山”之感。這對國家對自己來講，都沒有好處。

談到今後如何在社會學、政治學領域中開展百家爭鳴時，到會的人都認為，要開展百家爭鳴，必須解決人力和圖書資料的問題。毛啓俊說，解放後，研究社會學的人分散各處，要開展社會學的研究工作，應該把對這門科學有研究的人才組織起來。應成一建議，要開展科學研究工作，對有關的資料應該進行調查摸底。

最後，大家認為，進行社會學和政治學的研究，一方面固然為了批判資產階級的社會學和政治學，並吸收它的有用部分，一方面也為了建立馬列主義的社會學和政治學。

（1957年5月5日“文匯報”）

一些政法教授在上海民盟座談會上

## 要求在大學恢復政治學課程

本报上海8日电 政治学这门课程，在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被一棍子打死了。作为一门科学来说，它成了一个空白点：为了在十二年内赶上世界科学水平，这门学科，在大专学校有恢复的必要，这是今天在民盟上海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到会的三十多位政法专家教授中绝大部分人的共同意见。

这个座谈会是适应盟员和所联系的群众的要求召开的。座谈的题目是：（1）在现有大专学校政法课程的设置方面，有哪些项目为实际所需要而没有设置的，需要设置的理由在那里？（2）为了加强政法科学的研究，除了向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学习外，如何吸取我国过去和资本主义国家政法科学中有价值的东西。（3）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还需要在制度上、人事上和图书设备上，作那些相应的改进。

为什么要恢复政治学，综合到会发言人的几项理由：（1）它是一门社会科学；（2）作为政治问题来说：社会主义社会同样也存在问题；（3）培养政治人才——决策和行政人才的需要；（4）作为知己知彼来说：在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中，更须要知道他们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现在就有很多人不知道。

假定恢复政治学系，应该有那些课程。王造时说：在前次哲学科学研究委员会召开的座谈会上，有人提出五大类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党政治和行政。这些意见到会的政治法律学家周子亚、杨兆龙等都赞成。杨兆龙和张锐还强调行政学课程应列为重点。关于政治学不仅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就是封建王朝的东西也可以批判学习。有人例举说：“治事之官多则治，治官之官多则乱”这虽是封建的政治学，也有研究的价值。当然五大类课程，目前条件还不可能一齐开，可根据师资人力逐步的开。也有人认为政治学系的课程，都包含在其它的系或者科学院中，并且说：政治学系毕业后，没有什么出路，不赞成恢复政治学系。这个问题在座谈会上引起争论。有人说：作为科学来说，不应让它成为空白点，虽然国家设有政法学院，但是这些学院的课程不是以法代政，就是有法无政。

座谈会还建议科学院设置政治学研究所。

（载6月10日光明日报）



## 也爲社會學說幾句話（節錄）

### 言 心 哲

上海從事社會學和政治學的研究工作者，前不久曾舉行一次座談會，討論如何在社會學和政治學的領域內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互相交換意見（見5月5日文匯報）。現在我想就社會學方面來說幾句話，作為我的一點補充意見。

首先，我同意大家的發言，應立即恢復社會學的研究；……我認為當前最重要的問題，還是高等學校中社會學系的恢復問題。1952年院系調整時，把社會學系取消，在當時看來固然不對，現在看來更是不妥，這是因為社會學系被取消之後，有些原來在社會學系擔任教學的人員紛紛轉業，無法用其所學，發揮它的作用，在人事的安排上，發生不少的矛盾，造成許多人力上和物力上的浪費與損失。……我很同意陳達先生的意見：為了培養青年一代的接班人，應立即在各綜合大學或是財經學院中恢復社會學系，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和方法來講授社會學和社會調查等課程。但是我看社會學系如果再恢復的話，還是放在綜合性大學較為相宜，不應當放在財經學院，……。

當然，目前要立即恢復社會學系，還存在一些問題：第一，原來社會學系的教學人員已經拆散了；第二，社會學系原有的圖書資料在院系調整時，弄得常非混亂；第三，最近幾年來，新的資料沒有系統地收集，尤其是國外的資料，近幾年來，幾乎完全中斷。那麼，又怎麼辦呢？我想目前還不免有些阻力，我所說的阻力，指的是一個思想認識問題。我們現在首先要承認，1952年院系調整時把社會學系取消是做錯了，是以教條主義向外國學習，生搬硬套的後果，沒有考慮到我國的實際情況，但“有錯必糾”，一誤不容再誤，現在亡羊補牢猶未為晚。這是要恢復社會學系的一個前提，這一個前提如果解決了，事在人為，其餘一切問題，我想都可以逐步地獲得解決。……據報載（4月24日文匯報）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已經決定籌備成立社會學工作委員會，據我推測，社會學系的恢復問題，一定也在研究、考慮的範圍之內。

#### 一、關於人力問題的建議

……我建議中國科學院社會學工作籌備委員會應即作一個全面的調查與了解。聽說還有最近從國外留學回來的，其中也有學社會學和社會福利工作這一門的。此外，還有不少從大學社會學系先後畢業的學生，這幾年來，或在作與本行相近的工作，已有不少的实际經驗，但也有很多學所非用。……我們對這一批青年新生力量，不可低估。如果我們說是要來培養年青一代的接班人的話，應把他們作為重點。這樣看來，只要領導上有決心成立社會學系，把他們調配、組織起來，據我看來，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人力的問題不大，主要在於我們對於社會學（包括理論與應用部分）這門社會科學的認識與重視如何以為斷。

#### 二、關於圖書資料問題的建議

……必須從速有領導地、有組織地把一個地區各圖書館原有的有關社會學的重要圖

書資料，在可能範圍內，集中于未來的社會學系資料室，並通過專管對外文化聯絡機構，在可能範圍內定購一些外國有關社會學的雜誌和書籍。

### 三，關於社會學研究的範圍和社會學系的課程問題

……首先必須力求與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相配合，與政府各部門建立密切的聯繫。因此我建議先由科學院社會學工作籌備委員會，協同有關部門，就1950年高等教育部所頒布之社會學系課程的基礎上，擬一社會學系課程草案，再分發各地從事社會研究工作加以討論，然後再把各方面的意見集中起來，再開一全國性的會議加以決定。

### 四 希望兩點

第一，我們希望在上海也能有一個社會學工作籌備委員會分會或類似的組織，把上海社會學研究工作組織起來，商討在社會學方面如何來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社會學系的恢復問題，社會調查研究機構的建立以及社會學的範圍和作用等等。同時與北京方面取得聯繫。第二，如果有一天社會學系能夠恢復的話，希望原來一批搞社會學的人，能回到本行，一道為我們的共同事業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而努力。

（5月17日文匯報）

## “社會學工作籌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記錄

出席人：費孝通、雷潔瓊、吳景超、李景漢、吳文藻、陳 達、袁 方

時 間：1957年6月9日

地 點：南太常寺甲12號

主持人：陳 達

記 錄：袁 方

(一) 陳 達報告本會成立以來的情況，以及今後如何開展工作。

1. 本會成立以來，收到不少來信，這些信件的內容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一、祝賀

二、詢問工作如何開展

三、找工作

2. 今後如何開展

科學院今年在經費和編制上雖有困難，但為了本會工作的開展仍準備了一些經費（約5萬元）及編制名額（5人左右）。我們應本勤儉辦科學的精神，重點開展工作，但應全面考慮社會學方面的安排，有步驟的來進行。

雷潔瓊報告上海社會學界同人最近活動情況，多數人都主張在復旦大學恢復社會學系。他們已經開了一個會，組織起來，先做一些調查研究工作。今後本會應與他們取得聯繫。

5. 討論事項：

關於本會名稱和任務：

名 稱：社會學工作委員會，隸屬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推陳達擔任主任委員。

任 務：

(1) 團結與聯繫原來社會學界同人，籌備成立中國社會學會；研究機構。

(2) 討論和建議有關社會調查研究工作的方案；

(3) 籌備成立社會學的研究機構和社會學系。

關於社會調查研究工作：

北京社會學界同人的調查研究工作暫分人口、勞動、城鄉社區調查與民族等方面進行。其它地方（上海等）可由該地同人結合當地具體情況開展工作。北京方面的調查研究工作如下：

甲、人口與勞動調查研究（附農村調查）擬暫由勞動幹部負責，與科學院合作。

一建議科學院成立社會調查研究所。直屬哲學社會科學部。但根據目前條件先成立人口學研究室。由哲學社會科學部領導。

1. 人口學研究室擬暫設下列各組

(1) 人口理論組。研究項目：馬克思列寧主義人口理論；新中國1953年全國人口普查以及對於今後人口普查的具體辦法與建議；國際人口（蘇聯，人民民主國家及資本

主义国家的人口)；中国历史上的人口等。

(2) 人口登記組。研究項目：人事登記制度；地区人口(城市，鄉村，少数民族地区)；移民(国际与国内移民問題)。

(3) 生育节制組。研究項目：生育节制的政策，家庭与婚姻等。

(4) 人口統計組。研究人口統計理論与方法等。

(5) 劳动問題組。因为人口与劳动問題密切聯系，所以在該机构內又應适当开展劳动問題的科学研究，如劳动經濟，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調查，工人运动史等。

2. 科学研究人員的配备。以上各組，每組平均約5人，共計25人，根据可能逐步配备。

3. 在北京附近选择30万左右人口的一个县作人口調查研究(附农村調查)的實驗室。

(1) 选县人口調查研究計劃。由陈达草拟。用本会名义向國務院科学規劃委员会申請专款。

(2) 选县人口調查研究工作可与其它国家机关合作，但須征得合作机关的同意。如国家統計局，內務部，衛生部等。經費与人力由科学院与合作机关共同負担；估計每年約30万元，編制約30人左右。此項工作可逐步开展，由小到大，由少到多。

(3) 选县人口調查研究工作，可以解决以下目前急需的几个主要問題：人口普查的方法，为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提供建議；人事登記制度；生育节制；婚姻年齡的研究等。此外，还可附带進行农業与农民生活的調查研究。

乙、城市社区調查研究，拟暫由人民大学社会調查研究室負責与科学院合作。开始北京市进行調查研究工作。

1、調查研究工作的具体領導由人大調查研究室負責，經費由人大負責，有需要时經費由科学院酌量補助；人員由本会酌量派研究員，研究助理參加工作。

2、調查計劃由人大調查研究室提出。推李景汉，吳景超，趙承信負責草拟。本会参与研究，由人大与科学院共同决定。

丙、民族学研究。已有中央民族学院負責進行，建議添聘社会学专家参加世界民族志編写工作。

1、經費及編制由民族学院負責；

2、拟請中宣部协助民族学院調集原來社会学教授5—7人，而現在安排不当者，經原机关同意，請高教部批准。

(三) 关于筹备成立社会学系的計劃。

1、为了培养人材，在高等学校成立社会学系，大家認為有必要，但需要一、二年准备。

2、目前先拟教学計劃，經大家討論由本会提請中宣部、高教部考虑並作决定。教学計劃推吳文藻、潘光旦、雷潔瓊、林耀华等負責草拟。

3、着手准备課程，希望二年內拿出一套比較成熟的教材。教材事先写好，大家討

論。

4、准备課程要有个地方，必須先集中一些人，北京可集中一些，上海等地也可集中一些。先搞調查研究，二年後可掌握大批实际材料，准备課程和开課都有基础。

5、条件成熟，可在北京，上海等地逐步建立社会学系。

(四) 关于筹备成立中国社会学会

1、先調查研究，了解情况，加以登記。會員包括过去教社会学的和社会学系畢業生。

2、筹备工作由本会負責。与上海等地取得联系。

3、总会設在北京，其它各地可設分会。

4、个人發言記錄：

(1) 吳景超發言：

一、成立社会学会。

二、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地成立社会系，可以很好的安排过去的人。

三、科学院成立社会調查研究所，先从人口下手。

四、人大有条件，如理論課、社会調查、人口与劳动、家庭、都市、社会工作等，有一、二年准备即可。

学生出路：市政府、法院、妇聯、內務部、劳动部、工会。

(2) 費孝通發言：

一、調查过去搞社会学工作的，准备成立学会。对过去搞过社会学工作的——教过書的，畢業生，進行安排。

二、考虑一个比較長远的計劃。

(1) 培养後备。有步驟的来做，但須有个地方来准备。教学計劃的目的，成立完整的系，先从开課始，从現在的基础来發展。多少時間，看条件（在个别的学校开，人大、北大、民族学院）。拟調柯象峯、應成一等五、六人到民族学院。

(2) 先集中一批人，准备功課再分散，人大可集中一批，民族学院也可以。

(3) 調查研究先开始，年輕人先搞調查研究，以北京为中心，作专题調查，二年以後就有資料，开課也有基础。

(3) 吳文藻發言：

(1) 安排人事，还有人尚未得到適當安排者，尽其安排。

(2) 准备成立学会，全国性的总会在北京，但上海另應有个中心，因人多。北京也應成立学会。

(3) 建議在北大成立社会学系，將來放在那里再看。

30—40人先作实际工作。

(4) 李景汉發言：

(1) 成立社会学系，至少要有一、二年的准备，越穩越好。

(2) 目前根据各方面能做的先做，找个实验县从事人口研究一、二年內即可有資

料。

(3) 社会学社会系設在綜合大学好。

改行者很多，从各方面來使其配个。

自覺自願，一定能力。

有条件，基本課有准备；拿出来学生沒有話說。有吳（景超）的資本就行。

北京有个系更好，精力有限。

新作風，一心一得，大民主，大家商量，取得一致。

(5) 雷潔瓊發言：

(1) 不是恢复社会学，而是創造新的社会学系。同意安排人也很重要。少数人准备教学計劃到底有什么，八年經驗，每人看社会学不一致，把社会学範圍、培养人材搞清楚，拟几門功課，再加以安排。

民政、民族、理論調查，社会工作其範圍包括什么，先了解过去訓練，現在搞什么。过去社会学很乱。人事安排不能完全自願。第一步了解情况，第二步是教学課程、教学計劃。人事都要安排很难。

理論課四門，24—26，22門功課开什么。

費孝通發言：

人事問題：

(1) 沒有失業的不动；

(2) 請其来开会可以抓一批人来。

社会学基础：

(1) 暂时不能成立专门机构。1. 劳干校；2. 民族学院；3. 人大。

(2) 系开始搞，1—2年工作委员会。1. 过去；2. 社会学系。

吳文藻發言：

研究开始建立系，物質条件。

(6) 陈 达發言：

(1) 同意搞系，拟教学計劃。

(2) 科学院对目前的工作今年給五万元，編制5人。

(3) 目前的工作要有：一个实验县，选一个地方，离北京不远，20—30万人作人口調查。1. 全国人口普查；2. 人事登記；3. 生育节制；4. 結婚年齡。

解决四个問題。但此錢和人数不夠；只能逐步开始。（費提議應申請专款）。

費孝通發言：

人口部分，农村調查，要30人30万元，申請专款。直屬人口研究室。

(2) 城市調查研究室。科学院委托专职秘書。（並提議由袁方担任）

陈 达根据大家發言綜合一致意見：

(1) 提出关于社会調查研究方案的建議。

(2) 筹备成立社会系的計劃（內容）。

( 3 ) 团 結 与 聯 系 原 来 从 事 社 会 学 研 究 工 作 者 。 —— 筹 备 社 会 学 会 。

( 4 ) 組 織 起 来 。 1. 社 会 学 系 —— 吳 文 藻 ， 潘 光 旦 ， 雷 潔 瓊 ， 林 耀 华 ； 2. 人 口 —— 陈 达 ； 3. 城 市 社 区 調 查 —— 李 景 汉 ， 吳 景 超 ， 趙 承 信 。

**关于右派分子图謀资产阶级社会学  
復辟，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  
活动的一些材料**

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

1957年8月